

身體政治與青春想像：

日據時期的臺灣小說**

梅家玲*

摘要

青少年是未來的國家中堅，社會棟樑，特別是在家國動盪，風雨飄搖的年代裡，青少年更因其所具備的「青春」、「希望」等特質，被寄予了無限厚望。無論是文學想像抑是現實中的革新實踐，作為「民族幼苗」、「國家未來主人翁」的青少年，都被賦予了空前的重要性；而「青少年成長」與「國家成長」，往往在文學想像中互為表裡，成為彼此象喻的一體兩面。

也因此，從一開始，二十世紀的中文小說，便不僅對各類青少年的成長與幻滅，多所演義；甚且，還以他們的愛恨悲歡，身世遭逢，見證著政爭烽火，社會遷變。1895年以降，臺灣曾經日本殖民統治半世紀之久，處身於日本政權之下，臺人由原先武裝抗爭，到後來的文化啟蒙，以迄於在皇民化運動下的順應曲從，二者關係，原就多轉折；體現在文學想像中，遂以此有多重駁雜的面向。本論文正是試圖由「身體政治」與「青春想像」角度切入，藉以勾勒當時青少年論述與臺灣想像在臺灣新文學中相生相成的發展軌跡。主要論述分為兩大部分：一、身體與空間／認同政治；二、從臺灣身體到皇民身體。

關鍵詞：身體政治、青春想像、日據時期、臺灣、小說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暨中國文學系教授。

** 本論文為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專題研究計畫「正典的生成：臺灣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係」子計畫「少年臺灣：多重文學因緣中的少年論述與臺灣想像」部分研究成果；初稿曾宣讀於中央研究院文哲所「正典的生成：臺灣文學國際研討會」（臺北：2004年7月15-16日）。會中承蒙施淑教授、陳萬益教授提供修正意見，謹此致謝。

一、前言

青少年是未來的國家中堅，社會棟樑，特別是在家國動盪，風雨飄搖的年代裡，無論是文學想像抑是現實中的革新實踐，青少年每因其所具備的「青春」、「希望」等特質，被寄予無限厚望。而晚清以來，「青少年成長」與「國家成長」，更往往在文學想像中互為表裡，成為彼此象喻的一體兩面。¹

也因此，從一開始，二十世紀的中文小說，便不僅對各類青少年的成長與幻滅多所演義，甚且，還以他們的愛恨悲歡，身世遭逢，見證著政爭烽火，社會遷變。1895年以降，臺灣曾經日本殖民統治半世紀之久，處身於日本政權之下，臺人由原先武裝抗爭，到後來的文化啓蒙，以迄於在皇民化運動下的順應曲從，二者關係，原就多有轉折；體現在文學想像中，遂以此有多重駁雜的面向。本論文正是試圖由「身體政治」與「青春想像」角度切入，藉以勾勒當時青少年論述與臺灣想像在臺灣新文學中相生相成的發展軌跡，並探析相關問題。

基本上「青少年」之所以成為「青春」、「希望」的象喻，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生物學上的原因——具有年輕的、正在成長發展中的身體，它所孕育的，正是走向未來過程中，無限進步躍昇的可能性。然而，身體的生成從來就不只是生物性的問題，從傅柯（Michel Foucault）到巴赫汀（M. M. Bakhtin），晚近各種論述，在在提醒我們：在肉身已然存在的前提下，各式各樣的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教育、公共衛生等力量，正透過不同管道，無孔不入地介入了身體的建構工程，身體因此成為各方權力競逐角力的輻輳點；可是另一方面，身體卻也可以藉由醜怪的扮裝表演、肢體踐行，彰顯其對既有體制的嘲諷、抗衡、拒絕或顛覆；此外，由社會學、文化人類學等角度看待身體，指出它的世界性、社會性與消費性特質的論述，更所在多

1 在傳統文化中，青少年固然也曾備受重視，但意圖以「少年」來頡抗「老大」，並視之為新興國家希望所繫的論述，卻是為晚清以來所特有。自梁啓超揭櫫「少年中國說」以來，「少年論述」與新興之「中國想像」幾成不可分割之一體兩面。詳參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啓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啓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19.1 (2001.6): 249-276。

有。² 而或強健、或病弱的各式身體樣態，更是文學想像中，多樣化修辭策略的構成基礎。「身體政治」，因此成爲各類文化與文學論述中，不可忽視的重點。

再者，若從時間角度著眼，「青春」原是凝定於特定時間維度中的想像符碼，象喻著事物的初生新發，方興未艾。二、三〇年代的臺灣，新文化運動正如旭日初昇，文學青年蓄勢待發，各式青少年論述一如雨後春筍，勃然蔚起，正所以爲臺灣投射出前所未見的「青春想像」。³ 然而，不容否認的是，殖民地的文化政治與社會現實，畢竟有其特殊性，俯仰其間，作爲「青春」主體的臺灣青少年，將要如何以一己的身體，去「體」現此一特殊歷史情境中的各種社會文化政治轆轤，自然特別值得關注。限於篇幅，本文在此以臺灣小說爲對象所進行的初步探討，將集中在以下兩項議題：

- 身體與空間 / 認同政治
- 從臺灣身體到皇民身體

2 參見傅柯(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London: Tavistock, 1973);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等; 巴赫汀(M. M. Bakhtin), *The Dialogic*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1981); *Rabelais and His Wor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等。其它關於身體與社會文化之交合關係的相關論集，至少還包括 Bryan S. Turner, *The Body and Societ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84); Mike Featherstone, Mike Hepworth and Bryan S. Turner, eds.,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e Theor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1); John O'Neill, *Five Bodies: The Human Shape of Modern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等多種。

3 如張我軍在〈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中即大聲疾呼：「敬愛的青年諸君呵！那些不良老年們我是不敢承其抬舉。最少希望諸君能夠覺悟青年之於社會上所處的地位，出來奮鬥，不斷地勇進，才有達到目的的一日！」原載於《臺灣民報》2卷7號，1924年4月21日，後收入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臺北：人間，2002），頁3。另如芥舟的〈社會改造與文學青年〉，也力倡由文學青年來改造社會：「刻下的我們，有所期待於圓熟老大的文藝家，寧持吃力要求於文學青年的自覺力，爲將來社會的中堅，能夠負得改造和創造的職責，是捨真摯熱烈的文學青年，發揮其遠大的理想與不拔的信念，具現於文藝的全分野，以領導民眾趨於將來圓善的新天地，以外應是少有希望的了。我們的文學青年，要知道逼迫的風雲已在需要你們非進出于戰線不可了，這是最後的一戰的，你們的使命是這麼重，而時代所期待於你們的心是這麼急，你們寫出來的文學，是淚是血，是新社會改造的機緣，是將來幸福的潛在動力，唯其如此，庶不愧爲我們的文學青年了。」原載《南音》1卷11號，1932年9月27日，引自李南衡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臺北：

二、身體與空間 / 認同政治

隨著日本在臺建立殖民政權，臺灣一連串「現代化」的革新措施，也逐步展開。舉凡新式學校的設置、工廠建築與生產效率的計算、衛生醫療習慣的改良、守時守法觀念的建立等，無不有別於過去的傳統臺灣。這些措施所針對的面向雖殊，但都不約而同地為臺灣帶來空間地景上的變化，並藉由權力運作，影響身體生成。至於為了貫徹帝國統治的意識形態支配，對都市空間進行大規模改造，其影響力更不在話下。⁴然而與此同時，游移於不同空間中的身體，卻也以個人的往來趨避、肢體展演，體現出政治或文化認同上的駁雜性，甚且，反過來左右了空間屬性的建構。本節論析，將以青少年身體於不同空間中的游移往來，檢視其間的認同流變。

1922 年，《臺灣》雜誌上刊出追風（謝春木，1902-1969）的〈她要往何處去〉，是為臺灣新文學史上最早的白話小說之一，內容雖是青年男女的婚戀故事，其間所折射出的意涵，卻不妨視為此後臺灣青少年於不同空間中開展追尋認同的起點。在這篇以日文寫就的小說中，作者塑造了一位臺灣少女桂花，她在傳統社會的父母之命下，與留日青年學生清風訂下婚約，並滿心期盼未婚夫學成返鄉。不料，接受新式教育的清風在訂婚之前原本就另有所愛，對於父母的安排深感痛苦，無法接受。回臺之後，他力抗此一不合理的制度，並要在舊社會中「點燃改革的烽火」，解除婚約。桂花雖深受打擊，但幡然夢醒之後，不僅勇敢面對此一事實，體悟到「都是社會制度不好，都是

明潭，1979），頁 139。

- 4 以臺北城為例，日本當局在大屯山南麓建立臺灣唯一官幣大社的日本神社，使之成為「神域」，又在城內移植來自於日本母國的遊廊、歌舞伎、和櫻花等。此外，汽車、霓虹燈、商店櫥窗、咖啡屋、電影院等現代化都市景觀，也所在多有。分見陳連武，「風水——空間意識形態實踐：臺北個案」（臺北：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郭水潭，〈日據初期北市社會剪影〉，收入《郭水潭集》（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1994）；柯瑞明，〈臺北日據時代日本娼妓物語〉、〈臺北風月滄桑〉，收入所著《臺灣風月》（臺北：自立晚報，1991）等。這些都市空間的改造，對於三〇年代新興知識分子的感覺世界影響甚鉅，並成為日據時代臺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重要起源。參見施淑，〈日據時代臺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收入所著《兩岸文學論集》（臺北：新地，1997），頁 102-120。

專制家庭的罪。我只是犧牲者之一而已。……整個臺灣不知有多少人為這個制度而哭著，如今我都明白過來了。我要為這些人奮鬥，勇敢地奮鬥下去！」甚且，還要以選擇隨表兄到東京留學，「努力讀書」，作為她的「去處」。⁵

以現今眼光看來，作者安排新青年來對抗舊制度，並以「到東京讀書」，作為問題解決之道，未免失之一廂情願。然而，若著眼於其中的空間認同追尋，則〈她〉文在自由戀愛、改革舊社會等普遍性的新文化訴求之外，特別強調「到東京（日本／都會／異鄉／內地）去讀書（接受新式教育）」，恰恰是微妙地披露出當時臺灣青少年在進行空間認同追尋時，心中最重要的幾個選擇項目——日本，還是臺灣？都會，還是鄉村？異鄉，還是故鄉？舊書房，還是新學校？也因此，在此後許多小說中，我們不斷看到許多臺灣青少年在這些不同空間中游移往來的身影，而自由戀愛，改革實踐，以及各種意識形態的交相作用，更是為他們的認同增添變數，彰顯出特有的駁雜性。其中值得思辨的議題，至少包括：不同的空間追尋，是否，或者如何，體現不同的認同取舍？身體的歸趨，是否必然就是精神意向的完全投射？從歷時性角度觀照，不同時期的身體位移，又將如何隨著外在政治現實的改變，宣示著認同的流轉或質變？

無可否認地，儘管臺灣對殖民政權始終抗爭不斷，但日本及其為臺灣所帶來的現代（城市）文明、資本主義布爾喬亞式生活，以及透過教科書強力播散的日本「國民」意識，⁶卻促成不少臺灣人民——特別是二〇年代以後，受過殖民地公學校教育的知識青年，對它心嚮往之。「到日本（東京）

5 《臺灣民報》，1922年7月10日。

6 經過有心的教材設計，公學校課程除了國（日）語文之外，更藉由史地修身等科目，灌輸學生日本意識，其目的正是要將本島的臺灣少年，徹底改造成日本的「少國民」。具體做法，包括在國語課本中植入與日本國家、皇室或神道信仰有關的主題，落實以日本為主體的歷史教育等。即使是臺灣鄉土地理課程，也抽去「人」的活動，只留下交通、貿易、產業數據、物質建設的介紹。此一將「人」異化的操作，正是意圖切斷少年學子對臺灣過往歷史文化的認知，轉向對現代文明及日本的國家認同。關於殖民地教科書的研究，可參見許佩賢，「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周婉窈，〈實學教育、鄉土愛與國家認同——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第三期「國語」教科書的分析〉、〈失落的道德世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之研究〉，俱收入所著《海行兮的時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2003），頁215-294、295-374。

去」，因此既可以是自我理想的追尋與實踐，也可以是迫於現實的另尋出路。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此一由〈她要往何處去〉開啓端緒，因婚戀問題而以日本為追尋／出走目標，意欲衝決舊社會網羅的敘事，後續發展卻未必是讓新青年在日本開創新事業，或是學成歸臺後造福桑梓，反而多半是讓他們在不斷的個人戀愛故事中，走向頹廢的感覺世界。這類敘事在巫永福（1913-）〈山茶花〉（1935）、翁鬧（1908-1940）〈殘雪〉（1935）等以留日男女青年為主角的小說中被發揚光大，並由翁鬧〈天亮前的戀愛故事〉（1937）集其大成。所呈現的，正是資本主義浸染下，青年們由追尋個人心靈自由而逐步走向陷溺於自我世界的徑路；在這些天真的、理想主義的身影下，隱藏的正是殖民統治集團以強勢意識形態切斷了臺灣歷史文化後，極度膨脹而終至破裂的個人自我。⁷

與此同時，另有許多沒有機會離開臺灣的本島青年，仍不免要退而求其次，將心中的日本／現代化欽羨，落實在對殖民政權為臺灣所帶來的不同空間環境的選擇上。殖民景觀的整飭潔淨，對比著本島居所的髒亂殘破，龍瑛宗（1910-1999）〈植有木瓜樹的小鎮〉（1937）曾有鮮明描述，⁸它正所以召喚著本島青年以「住日本式房子，過日本式生活」，作為畢生的奮鬥目標。⁹

7 施淑曾有多篇論文對此做過精闢論析，請參見〈日據時代小說中的知識分子〉、〈感覺世界——三〇年代臺灣另類小說〉、〈日據時代臺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俱收入氏著《兩岸文學論集》，頁 29-48、84-101、102-116。

8 隨著主角人物陳有三來到小鎮，龍瑛宗讓他看到本島人的居住環境是：「街道污穢而陰暗，亭仔腳的柱子熏得黑黑，被白蟻蛀蝕得即將傾倒。「走進巷裡，並排的房子更顯得髒兮兮地，因風雨而剝落的土角牆壁，狹窄地壓迫胸口；小路似乎因為曬不到太陽，濕濕地，孩子們隨處大小便的臭氣，與蒸發熱氣，混合而昇起」。然而「通過街道，馬上就看到 M 製糖會社。一片青青而高高的甘蔗園，動也不動；高聳著煙囪的工廠的巨體，閃閃映著白色」。「走到街道的入口處，右邊連翹的圍牆內，日人住宅舒暢地並排著，周圍長著很多木瓜樹，穩重的綠色大葉下，結著累累橢圓形的果實，被夕陽生微弱茜草色塗上異彩」。分見〈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收入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龍瑛宗集》（臺北：前衛，1991），頁 13、14、19。

9 如〈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的洪天送，「他在這世間唯一的希望是忍耐幾年之後，升任一定的職位，住日本式房子，過日本式生活」。同上註，頁 20。此外，龍瑛宗另篇小說〈黃家〉的男主角若麗，一心想去東京發展，然而事與願違，後來只好酗酒度日，自我逃避。該文收入葉石濤、鍾肇政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卷 7〈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臺北：遠景，1979），頁 65-100。

而此一「人在臺灣，心向日本」的身心分離，又早在巫永福的〈首與體〉（1934）中，就已現出端倪：留日的學生被家裡召回臺灣結婚，滿懷不願，遂形成「首與體的相反對立狀態」——「因為他自己想留在東京，可是他的家卻要他的『體』，一封接一封的家書頻頻催他『返鄉』，理由是要他回家解決重大的結婚問題。所以他想留在東京」。¹⁰

首與體的分離對峙，揭示的不只是身體與意欲的悖反，更是殖民地青年文化主體的顛倒錯亂。¹¹〈首與體〉小說最後，敘事者一再提到首體異類的「史芬克斯」（Sphinx）神話，並詰問：「這指的是人嗎？」¹²更將小說意旨提昇到寓言層次，凸顯出其中艱難的認同困境。此後，臺灣青年無論身在何處，都寧以日本為「首」，除了是身體／空間認同的否定辯證外，同樣為其間所涉及的「身體」與「主體」問題，留下許多辯難的空間。

另一方面，相對於由現代日本／資本主義所導致的頹廢錯亂，楊逵（1905-1985）〈送報伕〉（1932）則在同樣是往東京尋找出路的前提下，開展出組織群眾，投身工運的左翼關懷：出身臺灣農家的青年學生楊君，在家中土地被殖民者巧取豪奪，家破人亡之後，隻身赴日求學打工，又遭派報社剝削欺壓，終至促成了他階級意識的覺醒，並贏得工運的最後勝利。小說結尾，楊君決定搭船離日返臺，繼續奮鬥，「我滿懷著確信，從巨船蓬萊丸底甲板上凝視著臺灣底春天，那兒表面上雖然美麗肥滿，但只要插上一針，就會看到惡臭逼人的血膿底迸出」，¹³這番話，無疑宣告著：知識青年邁出書齋，走向工農群眾的另一空間活動路線，正方興未艾。同時，似乎也意謂著：從日本留學歸來的知青，或不免要懷著啓蒙者的使命感，去教化本島同胞。

以是，將觀照焦點再度轉回臺灣本島，便會發現：三〇年代出入於朱點人（1903-1949）〈島都〉（1932）、楊守愚（1905-1959）〈決裂〉（1933）、王詩琅（1908-1984）〈十字路〉（1936）、〈沒落〉（1936）等小說中的，正是

10 〈首與體〉，收入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翁鬧·巫永福·王昶雄合集》（臺北：前衛，1991），頁180。

11 參見陳芳明，〈史芬克斯的殖民地文學——《福爾摩沙》時期的巫永福〉，收入所著《左翼臺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臺北：麥田，1998），頁121-140。

12 同註10，頁184。

13 〈送報伕〉，收入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楊逵集》（臺北：前衛，1991），頁58。

臺灣青年輾轉於各類群眾運動的身姿。值得注意的是，屢仆屢起者固然有之，但更多的，反而是沒落沈淪，壯志銷磨。他們與陷溺於個人情愛的、留日的頹廢青年取徑雖殊，卻終不免於殊途同歸，走向自我的幻滅。

然而，隨著「決戰時期」皇民文學的產生，四〇年代以後，原先游移於不同空間，絕大多數悒鬱齎志的青年們，卻不但不再有首體對峙的困擾，反而滿懷自信，投身於本島不同的工作場域，並展現了此前未見的昂揚氣象。以周金波（1920-1996）〈水癌〉（1941）與呂赫若（1914-1951）〈山川草木〉（1944）為例，小說敘述的都是留日青年男女返臺工作的故事，主角人物積極奮進的姿態容或相同，但與空間往來互動的模式，卻大相逕庭，因此分別為青少年的身體／空間認同，投射出兩種完全不同的想像模式，箇中曲折，尤其值得仔細思辨。

1941年，年方二十一歲的留日青年周金波，發表了他生平第一篇小說〈水癌〉，備受讚譽，從此躍登文壇，成為各方矚目的新秀。這篇小說以一位留日歸來的年輕執業牙醫為主角，一開始，就披露不少與先前迥異的現象：

他醒過來，仍舊躺著，一面在新鋪的綠蓆氣味中把玩，一面回憶東京留學時代。好幾年沒有在榻榻米上休息了。對在榻榻米度過的學生時代的懷念復活起來之後，又有更大的感慨湧上心頭。認為向高水準的生活接近一步——還認為完成一項義務——倒不如說變成某種不易獲得的優越感，緊緊地逼迫全身。

在榻榻米上過像日本人的生活！

這使他洋洋自得，使他抱定漠然而嶄新的希望。

以七七事變為轉捩點而加速進行的皇民鍊成運動，不用說，從站在領導階級地位的他們腳下向外擴展。它以點燃野火一般的氣勢，燒燬迷信，打破陋習。

他在治療患者牙齒的當兒，並沒有忘記宣傳它的必然性。

……

轉眼間，寢室的床鋪搬開了，被改造成榻榻米房間，他就在那兒起居。他，自不必說，他的家人起初固然感到不舒服，只要一習慣，也開始稱讚，並可以在榻榻米上輕鬆自得的生活了。尤其是孩子們，在上面跳來跳去，好像覺得可以誇耀。

他用手摸一下榻榻米，感到極為滿意。

島民是可以教化的，而且可以比所預想的更為容易，更迅速地辦到——他所

一直抱定的信念，被最近突然抬頭的強有力的自信迅速地推上去。¹⁴

在此，「他」抱定信念，意欲教化本島同胞，看來似乎還是過去知識分子啓蒙使命的延續；然而，自覺於一己「領導階級」的身分，並且要配合「皇民鍊成運動」，精神取向上其實已與早期文化啓蒙者完全不同。不止於此，不論是相較於〈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那位一心想「住日本式房子，過日本式生活」而未可得，只能望日人住宅興嘆的青年洪天送，或是同篇小說中，原本一心奮發向上，最後卻不免要讓小鎮怠惰性格滲入肉體，讓「寂寞而懶惰的小鎮空氣風化了意志」的陳有三，¹⁵〈水癌〉中的「他」都展現出反過來要改變、創造外在環境的強烈動能：將寢室改造成榻榻米房間，讓自己，也讓家人「在榻榻米上過像日本人的生活」。循此，則即或身在臺灣，仍可經由空間的改變，儼然擁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使孩子們都因此「覺得可以誇耀」。

姑不論此一「誇耀」心態是否可議，從因隨外在空間的條件特性或象徵意義而被動地往來趨避，到釜底抽薪，主動對空間進行根本改造，表面可見的，固然是青年人一改頹廢消沈之態，積極奮進，不同既往。然而隱藏其中的，其實正是認同的內涵的質變。如果說，早先〈她要往何處去〉以日本為歸趨，是揭示本島青年對於日本現代文化／資本主義生活的嚮往；〈送報伙〉往來於臺日之間，是闡明他們對左翼／無產階級理想的身體力行，〈水癌〉卻是在臺灣本島以同時進行空間與自我意識的改造，宣示作為「皇民」的理所當然。而當年輕的身體輾轉於這些不同的空間認同之間，進行連串的改造與被改造時，臺灣是否還有所謂的「主體」可言？未被改造的地景風貌，又將會與活動於其間的青年們發生何種互動關係？在此，呂赫若的〈山川草木〉，或可提供另一面向的觀照。

〈山川草木〉塑造了一位留日女學生寶連，她原本留日學音樂，立志成為為臺灣爭取榮譽的女性音樂藝術家，某日父親逝世，回臺奔喪，由於不能見容於繼母，為了照顧年幼弟妹，她只好自動放棄日本學業，帶著弟妹入山務農，人生從此轉向。作為寶連好友的小說敘事者，原本深感惋惜，然而，若

14 周金波，〈水癌〉，收入中島利郎、周振英編，《臺灣作家全集·周金波集》（臺北：前衛，2002），頁3-4。

15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頁49。

干時日之後，他與妻子入山探望寶連，卻大大驚喜於她的轉變：

四、五個月不見，差點認不出來，臉被太陽曬黑了，也變得結實，看起來有年輕人的光彩。我從未看過這麼有朝氣而又健康的寶連。以前在東京時，她那種人爲的濃粧，紅唇濃眉，那種美看起來很令人擔心，但現在我覺得勞動的女性也是一種美。驚訝寶連這種完全與以前不同的健康美，我想一定是生活的關係，我輕輕地鬆了一口氣。¹⁶

而形成如此「健康美」的「生活」，無疑根源自於臺灣的山川草木。在敘事者夫婦入山途中，一路所見的本島鄉土風致，早已預示了寶連轉變的自然而且必然：

綠色的田地上的植物被風吹得激烈的搖動。那天感覺上有春的氣息，晴朗的天空，層層白雲，輪廓明顯的青山，在田裡休憩的水牛，掠過的飛鳥，眼中充滿鮮明的色調。妻子被這些鮮明的色彩所感動，直感謝寶連邀我們來這裡，眼裡浮出似乎已見到寶連似的光彩，我也同樣地感到喜悅……¹⁷

怡人的山川風物，健美的年輕身體，二者交相輝映，這真是日據時期小說中，少見的動人畫面。饒有興味的是，女主角爲了家庭責任自我犧牲，放棄學業，由日本回到臺灣，自城市走入鄉間，不僅與〈她要往何處去〉所揭示的女性歸趨形成明顯的對話關係，其中由身體所特別標示出的「勞動」特質，及因之而生的「健康美」，很可能也是左翼作者在不得不順應殖民政府戰時「增產」號召的同時，以上山下鄉，走向群眾，來表明一己政治姿態的隱喻。¹⁸此一現象，正所以提醒我們：檢視臺灣新文學發展的歷程，這些由文

16 呂赫若，〈山川草木〉，收入呂赫若原著，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臺北：聯合文學，1995），頁 489。

17 同前註，頁 487-488。

18 1940 年以後，日本殖民政府配合戰時需要，在臺力行皇民化運動，要求文學奉公，增產建設。楊逵、呂赫若、張文環等作家，都曾被指派到各地生產現場參觀，並寫作相關報導文章。在〈山川草木〉中，寶連曾表示：「沒有比不能回東京，藝術的志願受挫更痛苦的事了。每當夜裡想起總忍不住哭泣，但現在已習慣了田園的生活。我想我已有足夠的勇氣。現在提倡增產，我暫時拋下音樂，努力從事生產。是很不錯的生產戰士哦！」（頁 487）正是呼應了當時鼓吹「增產」的政策要求。不過，據施淑之說，這卻「可能是記錄著日據時代末期，走出小布爾喬亞的城市，重新踏上荊棘之路的左翼知識分子，透過勞動改造，在『皇民』的偽裝下，努力朝向『人民』轉化的另一部心靈秘史的作品」。見〈書齋：都市與鄉村〉，《兩岸文學論集》，頁 83。

學想像所投射出的身體，不僅要以己身於不同空間中的往來趨避，標舉認同的游移或質變，其本身的生理狀況，同樣糾結著駁雜的政治意涵。也因此，以下的討論，便聚焦於小說中青少年的身體 / 生理現象，進而探討其間的臺灣想像。

三、從臺灣身體到皇民身體

早有論者注意到，日據時期小說中的人物，「死亡」或「瘋狂」的出現率高得驚人。而小說中發狂或死亡的人物，泰半為農夫、農婦、童養媳與小孩；其主旨，不外藉此指控殖民政權或舊有陋習之迫害。¹⁹在此，本文則要進一步指出，除卻那些原本就屬於弱勢者的人物群之外，作為社會中堅的青少年，同樣要以身體的病弱衰敝，折射出此一特殊歷史時期中的臺灣處境。甚且，正是在這些年輕而孱弱的病體，及相應而生的療救之道中，我們得見意識形態、文化政治與社會現實的往來交鋒——而它的指向，正是如何由「臺灣身體」到「皇民身體」的質變。

(一) 島上病與死——病弱衰敝的臺灣身體

誠然，幾乎是從一開始，臺灣小說中就充斥了各式各樣的病體，以及隨之而來的死亡。這些島上的病與死，又以發生在青少年身上的，最為令人心驚。以「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1894-1943）小說為例，他的代表性作品〈一桿稱仔〉（1926）與〈可憐她死了〉（1931），就已明顯觸及此一主題：〈一桿稱仔〉的主角秦得參，才二十出頭，「他的身體，就因為過勞，伏下病根，在早季收穫的時候，他患著瘡疾」，由於無法下田，為養家活口，改做生意，遂才會因稱仔不公問題，與巡警衝突，終至身亡。²⁰稍後〈可憐她死了〉，年輕的丈夫為救回涉及工廠罷工的父親，「被警察打傷，回到家裡便不能起床，發熱嘔血，不幾日便死去」；妻子童養媳阿金為侍奉婆婆，忍辱當

19 參見許俊雅，〈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臺北：文史哲，1995），第4章第5節〈以死亡或瘋狂為小說的敘事架構〉，頁590-600。

20 賴和，〈一桿稱仔〉，收入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賴和集〉（臺北：前衛，1991），頁57。

富人姨太太，不料懷孕後反被遺棄，連同腹內胎兒，一起溺水而死。²¹

此後，楊守愚〈女丐〉（1931）中的少女不堪後母虐待，淪落風塵，不幸罹患梅毒而死；張文環（1909-1978）〈閹雞〉（1942）裡原本就孱弱的阿勇，也因太過勞累，得了瘧疾之後，「面孔黃得像色紙，大熱天裡還要蓋上棉被，抱著火籠抖個不停。熱來了，便喊阿爸阿母喊個沒完」。²²這些大都出身鄉土農村的青年男女們，一個個或過勞致病，或備受殖民勢力欺壓傷身，或以自己的身體為犧牲，獻祭於傳統陋習，都一改生理上原該呈現的青春成長常態，反以病亡之體，見證了日據時期小說中，「臺灣身體」的衰敝。

不止於此，許多都會中的知識青年，同樣是或病或死，氣息奄奄。楊守愚〈一個晚上〉（1931）中的年輕妻子勇於背叛大家庭，卻不堪家務操勞，熬不過癆病之苦，儘管病榻上不忘頻頻叮囑丈夫要繼續為理想社會奮鬥，還是免不了要以投環自盡，自我了結；²³王詩琅〈青春〉（1935）中的十八歲少女，受過臺北高女試驗，以首席畢業公學校，彈得好一手風琴與鋼琴，原立志以聲樂家立身，卻不料苦於肺癆，從此纏綿病榻，粉碎青春。²⁴朱點人〈紀念樹〉（1934）的年輕女教師梅，少女時代曾有一段錯失的愛情，後來為肺結核所苦，「不斷地發熱，遍身濕濕的流汗，若是稍動一點兒怒或是過一些兒勞力，手足就會冰冷，胸裡悸動得非常厲害，幾要絕息了的」。²⁵再看浪石生〈面頰〉（1936），才從高校畢業的男教師，勤於教育工作，致使面頰瘦削，體氣日衰，「吐出來的痰帶著討厭的黃色，聲音沙啞了，呼吸也困難了」。²⁶凡此，也都不得不讓人驚詫：是什麼樣的因素，摧折了這些風華正茂，日子正當年少的臺灣知青？而特別引人矚目的是，有別於鄉土青年病亡原因的不一而足，城鎮中的知識青年多數為肺結核所苦。疾病的類型差異，

21 同上註，頁 133-148。

22 張文環，〈閹雞〉，收入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張文環集》（臺北：前衛，1991），頁 234。

23 〈女丐〉、〈一個晚上〉，俱見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楊守愚集》（臺北：前衛，1991），頁 107-115、頁 123-132。

24 王詩琅，〈青春〉，收入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王詩琅·朱點人合集》（臺北：前衛，1991），頁 27-39。

25 同上註，頁 168。

26 浪石生，〈面頰〉，收入葉石濤、鍾肇政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卷 7《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頁 336-337。

是否也暗示了隱現於其中的文化政治？

事實上，從很早以來，西方的文化傳統便將結核病視為是一種「時間之病，它加速生命，照亮生命，使生命充滿精神」；「瀕死的結核病患者被描寫為美麗、有精神」的；因此，當浪漫主義者以新方式解釋死亡的寓意時，遂認為：「結核病造成的死消解了肉體，卻靈化了人格，擴大了意識」。循此，遂形成所謂的「結核病神話」：結核病受熱情所誘發，但這熱情必受阻擋，希望必受挫折。這熱情，儘管通常是愛情，但更可以是政治或道德的熱情。²⁷

據此回顧前述的結核青年，便會發現：其實，他們正是從不同方面，呼應了此一「結核神話」，並共同隱喻著殖民社會中的理想追求與挫敗：〈一個晚上〉之於無產社會的憧憬，〈青春〉之於藝術生命的渴盼，〈紀念樹〉對於錯失情愛的惘然，無不是熱情的阻擋，希望的挫折。無論是左翼關懷還是布爾喬亞意識，找不到出路，也看不見未來，卻是共通的宿命。而最後，挫敗的知青們集結在龍瑛宗的小說中形成對話——那以病弱的結核之身，寄託社會革新理念的集大成者，當然是〈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的「林杏南長子」；它的回應者，則是在小說中連名字都不曾出現的「林杏南長子」，「自小身體就不很好」，公學校畢業後，勤於自學，二十歲通過檢定考試，但也因此搞壞了身體。他罹患肺病，「長久臥病不起，醫治也不見起色」，終至撒手人寰。他蒼白、文雅、細緻、熱情，在在是結核患者的典型。試看他面對主角陳有三的自白，以及臨終前交付給陳的手稿，無不洋溢著「政治或道德的熱情」：

我的生命也許已迫於旦夕之間。但在我的肉體與精神將消失於永遠的虛無之瞬間為止，我要追求真實。不放棄我的追求。塞在我們眼前的黑暗的絕望時代，將如此永久下去嗎？還是如同烏托邦的和樂社會必然出現？……²⁸

二十三年的歲月也許很短。

我的肉體已毀滅，但我的精神卻活了五十歲、六十歲。

我以深刻的思惟與真知，獲得了事物的詮解。

27 說參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著，刁筱華譯，《疾病的隱喻》(臺北：大田，2000)，第2-3章，頁15-35。

28 這是林君面對陳有三的自白，《臺灣作家全集·龍瑛宗集》，頁65。

現在雖是無限黑暗與悲哀，但不久美麗的社會將會來臨。

我願一邊描畫著人間充滿幸福的美姿，一邊走向冰冷的地下而長眠。²⁹

顯然，這位青年空有理想熱情，卻拙於力行實踐，只能以冥想與等待迎向死亡；他的死亡，亦以此成為美學化的審美對象，失卻批判的動能。³⁰這是結核病的病理特質使然，也是它作為「神話」所內蘊的必然弔詭：結核病的美學，原就來自於理想的落空，追求的枉然；這一切落空與枉然，又所以見證了理想的崇高，追求的無可取代。

也因此，同樣是理想型的知青之死，當它不再是因為肺結核，而是其它病症時，所透顯出的意涵，就值得另行關注了。〈黃昏月〉中的彭英坤，正是這樣的例子。

彭英坤原是個氣意風發，振作有為的優秀青年，據敘事者描述，他中學時曾參加學校辯論大會，當時情景是：

在他那英挺的額角上，讓年輕的熱情洋溢著，以「青年與努力」為題，論到努力可以克服一切困難，達到目的，尤其青年，未來一片汪洋，而且富於勇氣，因此切不可讓青春虛擲，應為國家與社會努力以赴。

此外，他還是運動選手，尤其「跳遠」一項，曾是學校紀錄的保持者。每逢運動會，「一身運動服，頭上綁著布條，那美妙的跳躍，可以說就是年輕人的典範」。卻不料，幾年之後，他變得「眼窩下陷，顴骨突起，薄薄的嘴唇乾巴巴的，臉色蒼黑，而且太瘦了，看起來就像個衰老的老公公」。不久，他就罹患了惡性瘡疾，而非結核病，英年猝逝。³¹

回顧彭身故前的種種作為，如此結局應非偶然——在鬱鬱不得志的環境中，他酗酒、玩女人、借錢不還，任意撕下英文教科書頁為小孩擦屁股，正是指陳了理想的淪喪，生命的墮落。相對於結核病常被用以「譴責壓抑性的習俗／典範」，並隱喻著「對新政治秩序的召喚」，³²彭英坤卻只落得死於惡

29 林君臨終手稿，《臺灣作家全集·龍瑛宗集》，頁 70。

30 施淑曾據此闡析「左派憂鬱症」。說參〈龍瑛宗思想初論〉，收入臺大中文系編，《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大學中文系，2001），頁 263-274。

31 龍瑛宗，〈黃昏月〉，收入葉石濤、鍾肇政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卷 7《植有木瓜樹的小鎮》，頁 101-126。

32 見蘇珊·桑塔格著，刁筱華譯，《疾病的隱喻》，頁 93。

性瘡疾，身後蕭條，箇中意涵，恐怕是更深層的絕望與悲哀吧？³³

由此可見，青春身體的或病或亡，所反映出的，絕不只是單純的生理現象。殖民壓迫與傳統陋習交逼中的社會現實、無產社會關懷與布爾喬亞意識分峙下的理想挫敗，在在夾擊著彼時的臺灣身體，為之銘刻下衰敝的印記。因此，能否 / 如何振衰起敝，強健體魄，自然就不只是純粹的醫藥衛生、身體鍛鍊問題而已，而是匯聚了從政治制度到意識形態的全方位改造——究竟，臺灣的病體能否改造？如何改造？改造之後又將如何？這些問題，在所謂的「皇民文學」出現後，頓時有了不同面向的轉折。其間，周金波的〈水癌〉，恰可作為另一個討論的起點。

回顧前述，自「秦得參」以降，臺灣小說中的病體儘管無所不在，但它們的病狀，從來未曾像周金波〈水癌〉所描述得這般令人怵目驚心：

他向勉強半開的口腔裡面探視，禁不住呻吟一聲。莫可名狀的惡臭撲進鼻孔。像米糠泡菜一般的氣味馬上向四面八方擴散，簡直要悶住身旁人的嗅覺。下巴左邊移頰部的顎堤，被昇汞水燙爛成青黑色，齒齦被侵蝕得一塌糊塗。老早就超過第一期，第二期的水癌症狀，好比蹲下來似的，在口腔內的一角形成獨特的黑暗部分，一般人根本不忍正面看他一眼。³⁴

這是個臺灣少女的病體。她的母親好賭成性，一再延誤女兒病情，終至使她不治而死。而這位看診的「他」，正是前文曾提到的，那位要躺在榻榻米上過日本人的生活、把自己寢室床鋪搬開，將它改造成榻榻米房間的、自日本學成歸來的牙醫。他處處心向日本，對臺灣種種多不以為然。因此，撲鼻的惡臭，燙爛成青黑的顎堤，固然是罹癌少女口腔中的實況，但隱藏在此一診療實況背後的，未嘗不是一種鄙棄臺灣「病」體、意欲以優越感改之造之的「醫」者心態。此一心態，在他得知少女病故，母親卻無動於衷，反而變本加厲時，充分顯露：

這就是現在的臺灣。可是，正因為如此，才不能認輸。那種女人身上所流的血，也是流在我身上的血，不能坐視，我的血也要洗乾淨。我可不是普通的

33 龍瑛宗的另篇小說〈黃家〉也有類似情形：主角若麗原長於音樂，一心想去東京發展，然而事與願違，後來酗酒度日，自暴自棄，最後罹患的是胃疾。出處參見註8。

34 周金波，〈水癌〉，《臺灣作家全集·周金波集》，頁4-5。

醫生啊，我不是必須做同胞的心病的醫生嗎？怎麼可以認輸呢？……³⁵

從改造自我的居住環境，到做同胞心病的醫生，這位（作者化身的）牙醫顯然具有強烈企圖心。³⁶而他用以教化／療救島民的指導原則，自然就是所謂「以七七事變為轉捩點而加速推行的皇民鍊成運動」。由他所自述的「血也要洗乾淨」、「做同胞心病的醫生」等告白看來，此一面對「病體」所導發的「療救」，除了如何讓病弱的身體轉弱為強之外，當然也涵括了由「血」到「心」的徹底改造。事實上，皇民化運動原本所關涉的內容有四：1. 宗教與社會風俗的改革；2. 國語運動；3. 改姓名；4. 志願兵制度。³⁷戰時作家如周金波、王昶雄、陳火泉、張文環等，都曾就此有不少相關書寫，³⁸但其中尤以圍繞「志願兵」及「徵兵制」的主題為大宗。而且，它也是其中唯一針對「青少年」實行的措施。³⁹以下，便由它所關涉的「身體」問題為切入點，兼及「血」與「心」，探討因之而展開的青少年論述與臺灣想像。⁴⁰

35 同上註，頁 12。

36 具有此一心態者，不僅是小說中的醫生，更是周金波本人。據周自述，〈水癩〉實取材於他回臺省親之際的親身見聞：「我把省親之際所見的，對那個不顧重病少女沈迷賭博的母親的怨氣，全寫在〈水癩〉了」。見周金波，〈我走過的道路——文學·戲劇·電影〉，收入《臺灣作家全集·周金波集》，頁 279。另外，中島利郎也指出：該文的主人為指導知識階級、抱著「教化島民」信念的牙科醫生，我們可以將這人視為是周金波。見中島利郎，〈周金波新論〉，收入《臺灣作家全集·周金波集》，頁 3。

37 參見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收入氏著《海行兮的時代》，頁 34-73。

38 相關研究，可參閱垂水千惠，〈臺灣作家的認同意識與日本——周金波的近代觀點〉、〈日本統治與皇民文學——陳火泉的例子〉、〈多文化主義的萌芽——王昶雄的例子〉，俱收入所著《臺灣的日本語文學》（臺北：前衛，1998），頁 47-65、67-94、95-112；星名宏修，〈大東亞共榮圈的臺灣作家（一）——陳火泉之皇民文學型態〉、〈大東亞共榮圈的臺灣作家（二）——另一種「皇民文學」：周金波的文學型態〉、垂水千惠，〈戰前「日本語」作家——王昶雄與陳火泉、周金波之比較〉，俱收入黃英哲編，涂翠花譯，《臺灣文學研究在日本》（臺北：前衛，1994），頁 33-57、59-86、87-107。

39 據 1942 年 1 月 16 日總督府情報部發布的「陸軍志願者訓練所生徒募集要綱」，其「入所資格」明文規定在十七歲以上。見《臺灣時報》第 266 號（1942 年 2 月），頁 72。1943 年開始募集海軍志願兵，年齡規定則訂為「十六歲以上而未滿二十五歲」者。見，《臺灣海軍特別志願兵準備讀本》（臺北：高雄警備府，1943），頁 205-210。至於其它三項，都是全民性的運動，沒有年齡限制。

40 本論文對於「皇民身體」的論析，將聚焦於與「志願兵」有關的〈志願兵〉、〈無題〉、

(二) 振衰起敝？——志願兵與皇民身體鍊成

檢視諸多皇民書寫，很顯然地，因應戰時「志願兵」與「徵兵」制度所帶來的各種身心鍛鍊，正是使年輕的「臺灣身體」轉弱為強的關鍵。如張文環〈頓悟〉（1942）中的青年王為德，爲了打算去當兵，便決心辭去工作，打算「先回鄉下鍛鍊、鍛鍊體魄」。⁴¹另如周金波〈無題〉（1943），其中有兄弟倆，先前練柔道時，哥哥可以輕易地將弟弟身體提起來，用腳輕輕掃過去；然而當弟弟向學校申請志願少年飛行兵，並爲此開始先去做義務性的勞動服務後，情況顯有不同：出現在哥哥眼前的弟弟，「體格變得很健壯，日曬和勞動，以及有規律的生活、適當的飲食，會讓人有這樣的改變，這種成長讓他瞠目」。再次練柔道時，面對哥哥，弟弟因此「連動都不動」，甚至還可以抓著他的胸襟，「右手緊緊地向咽喉壓迫過來」。⁴²此外，周金波的〈助教〉（1944）更出現極具「樣板」性的情節：小說主角蓮本，原本因爲體格檢查沒能通過，無法投考醫專。但是，卻因在爲實施徵兵制而起造的「國民道場」中接受訓練，進而擔任助教，體質頓時改觀，不只是行軍數十里都不覺疲累，「生來毫無自信的這雙腳，在這次強行軍中證明了是一部不發生故障的貴重機械一樣」，即使只是綁起了腳，準備出發，都會「不覺地感到身體也振作起來了」。至於其它受過訓練的學員，更不忘要在離開道場後，頻頻表示：

小生自分別後，身體非常健康，現在減私奉公在擔任國家增產戰士。⁴³

〈助教〉（周金波）、〈道〉（陳火泉）及〈頓悟〉（張文環）等文本之上。至於王昶雄的〈奔流〉（收入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王昶雄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雖然是重要的皇民文學代表作，而且其中也有對於「臺灣身體」與「皇民身體」的多層思辨，但因與「志願兵」主題無關，故此處暫不討論。

- 41 張文環，〈頓悟〉，收入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張文環集》（臺北：前衛，1991），頁179-197。
- 42 周金波，〈無題〉，《臺灣作家全集·周金波集》，頁153-166。
- 43 周金波，〈助教〉，《臺灣作家全集·周金波集》，頁117-151。又，據周金波的兒子周振英之說，該文原是他父親接受總督情報課的委囑所寫的作品。當時被委囑的作家，包括呂赫若、張文環、龍瑛宗、楊達、陳火泉及周金波等多人。這些作家被派到各地的生產現場，進行報導紀錄，目的是以之「作爲一種戰意高揚的皇民文學」。而這些作家，也因之成爲中島利郎所謂的「間接的日本戰爭的參加協力者」。見周振英，〈我的父親——周金波〉，《臺灣作家全集·周金波集》，頁381。

所以如此，當因志願兵的篩選標準嚴格，競爭者眾，最激烈的時候，錄取率甚至不到六百分之一，⁴⁴強健的體魄，自是不可或缺。而志願兵之所以讓全臺青年風起雲湧，生死以之，除了殖民政府以「島民最高榮譽」鼓舞人心、發動青年團動員青年男女加入、製造青年同儕間的相互鼓盪，以及利用青年人的民族競爭心理，讓他們藉此證明自己比日本人還要優秀等因素外，⁴⁵就當時作家們在談及此一主題時所關注到的面向看來，至少還有兩方面的原因：

1. 它使得全臺青年得以在一個特定的共同目標下不分彼此，緊密結合，成就一體感。

2. 它給予臺灣青年莫大的希望和指引，讓男性藉由從軍而成爲完整的人，經由從軍或戰死，殖民地青年污濁、卑下的精神才得以淨化；若能爲國殞落進入英靈合祠的靖國神社，更可達內臺一體之境地。⁴⁶

其中，第一項因素可以周金波的親身體驗爲例。周的青少年時期都在日本度過，二十一歲回臺灣，始終與臺灣社會頗有距離，但 1941 年 6 月 20 日志願兵制度宣布實施後，境況遂大有不同，周曾在日記中寫道：

這一天，我特別感到充滿自信的喜悅，彷彿可以從漫長孤獨的殼中掙脫出來。……我和臺灣的社會一直有點距離，即使有接點，也不緊密。……可是等到六月二十日，志願兵制度宣佈，情況爲之一變，大家的表情變得生氣勃勃，話也多起來，完全露出真實的性情。我們坦然相對地「緊密」在一起了，同樣是來自於精神發揚的強烈要求，使這「緊密」結合成了可能。我心

44 1942（昭和 17）年第一次招募陸軍志願兵時，應募報名者 425,961 人，錄取 1,020 人；第二次 1943（昭和 18）年報名者 601,147 人，錄取 1,008 人；第三次 1944（昭和 19）年報名者 759,276 人，錄取 2,497 人，競爭率最高時（昭和 18 年）達六百倍，錄取者大部分在十九到二十三歲，最年輕者爲十七歲，最高齡爲三十歲，以當時人口 650 萬計算，除了半數婦女外，以十歲爲間隔，到六十歲的六個階段，應徵者從十五歲後半到三十五歲前半的二個階段來推算，昭和 19 年的 75 萬報名者，幾達適齡者的七成，想當志願兵。分見《興南新聞》，1942 年 6 月 10 日、1943 年 2 月 13 日；以及周振英，〈我的父親——周金波〉，《臺灣作家全集·周金波集》，頁 374-375。

45 參見周婉窈，〈從比較的觀點看臺灣與韓國的皇民化運動（1937-1945）〉，《海行兮的時代》，頁 70-72。

46 參見柳書琴，〈殖民地文化運動與皇民化：論張文環的文化觀〉，收入江自得編，《殖民地經驗與臺灣文學》（臺北：遠流，2000），頁 1-43。

想，我終於脫離了孤立的殼。因為志願兵制度有臺灣人的願望寄託，所以大家尋求的方向一致，眼神充滿真誠。⁴⁷

或許正是這「充滿自信的喜悅」，他寫下了為他贏得第一屆「文藝臺灣賞」大獎的小說〈志願兵〉（1941），其中的「身體」論述，因此特別值得討論。

〈志願兵〉的主要人物是兩位青年，一是自日本留學歸來的賴明貴，一是他的好友，一直留在臺灣的小學同學高進六。兩人相見之後，便開始議論「皇民化」問題。高進六當時早已參加「報國青年隊」，力行「神人一致的人間尊嚴修鍊」，排斥理論說法，強調「拍掌儀式」的重要，並以為這是皇民鍛鍊運動的不二法門：

拍掌時，神明會引導我們向神明接近，向至誠神明祈禱就是達到神人一致的境界，古代的祭祀就是這種神人一致的理念，祭典就是從這裡開始的，政教一致就是皇道的根源，我們隊員從拍掌儀式而能接觸到大和精神，努力去體驗大和精神，這種體驗是過去的臺灣青年很少有人領會到的。

我們經過一種拍掌的形式產生一種信念，就是這種信念的問題，這種能成為堂堂正正日本人的信念。

我們吃飯前也拍掌，要出去訓練以前也拍掌。⁴⁸

賴明貴則以現代文明知識分子自居，對此一借用神力的作法不能接受，「覺得臺灣的中堅青年用這種方法培養出來感到有點恐懼」，他認為，臺灣到現在為止還是「很渺小的人種」，應該要把「那些以前缺少的教養和訓練趕快去實行」，「趕快把臺灣的水準拉到和日本內地一樣」。他不願「像進六一樣像被矇住眼睛的拖馬車一樣」，並且仔細盤算：為什麼臺灣人不當日本人不行的？理由是：

我在日本的領土出生，我受日本的教育長大，我日本話以外不會說，我假如不使用日本的片假名文字我就無法寫信，所以我必須成為日本人以外沒有辦法。⁴⁹

此一心態，一則呼應了此前（包括〈水癌〉醫生在內的）留日知識分子的菁英意識；再則，也暴顯出：隱藏在此一意識之後的，原來是「在東京所

47 周金波，〈我走過的道路〉，《臺灣作家全集·周金波集》，頁281。

48 周金波，〈志願兵〉，《臺灣作家全集·周金波集》，頁32。

49 同上註，頁33。

得到的知識階層的計算的想法」。以致，當他得知高進六義無反顧，「血書志願」之後，不得不甘拜下風：

去向進六道歉了，輸給他了，進六才是為臺灣而推動臺灣的人材，我還是無力的，無法為臺灣做什麼事，……這個傢伙割了小指寫血書，這點我做不到，今天，我很男子氣概的向他低了頭。⁵⁰

賴、高二人的論爭，明顯涉及留日與本島青年的路線之爭：留日知識分子精打細算，理論掛帥，終不及本島青年的身體力行。⁵¹賴向高「低下了頭」，這對於先前處處心向日本，視臺灣為「病體」的留日知青而言，看來真是一大反諷，但卻也從另一方面，證實了「志願兵」之於本島青年的特殊意義，那就是：即或身在本島，即或未必具有留日的知識背景與文明素養，即或借神明力量以體驗大和精神的努力被否定，還是可以憑藉著宣誓效忠的「血（書）」、奉獻於皇國戰事的「身體」，「體」現了自己與日本人的一無二致，贏得尊嚴與尊敬。它的極致，便是如〈無題〉中的志願兵弟弟所言：「我會去死給你看，而且死得高潔光榮」⁵²——讓自己的「皇民」身體粉「身」碎骨，為國捐「軀」。

顯然地，這一以「殉國」為理想極致的皇民身體論述，凌駕並總結了一切著眼於精神文明／心的改造／國語運動等體現日本皇民精神的其它論述，⁵³成為終戰前本島青年共同心嚮往之的歸趨。此一論述同樣也見於陳火泉的代表作〈道〉：三十餘歲的男子青楠日夜苦思如何成為皇民之「道」，幾經轉折，仍以「為君捐軀」為不二法門。雖然以他的年齡及病質的體格，幾乎沒有入選的可能性，還是要頻頻強調：「當勇敢赴死於沙場，既決意捨身則無欲望，但願成為皇民而後已」。小說最後，他甚至要求友人稚月女：

50 同上註，頁35。

51 據周金波本人自述，〈志願兵〉描寫同一時代兩種人的想法：一是精打細算型，二是不需要理論，一心認定自己就是日本人。前者以賴明貴為代表，後者以高進六代表；唯後者才能肩負臺灣的未來。見〈關於徵兵制〉座談發言，收入《臺灣作家全集·周金波集》，頁236。

52 《臺灣作家全集·周金波集》，頁153。

53 相關論述，可參見劉紀蕙，〈從「不同」到「同一」：臺灣皇民主體「心」的改造與精神的形式〉，「二十世紀臺灣男性書寫的再閱讀——完全女性觀點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政治大學，2003年10月）。

如果戰死了就請妳幫我弄個墓誌銘吧！比方——「青楠居士生於臺灣，長於臺灣，以一個日本國民而歿」；或者「青楠居士為日本臣民，居士為輔弼大業而生，居士為輔弼大業而活，居士為輔弼大業而死」。⁵⁴

由此看來，所謂的「皇民化運動」，雖然使得原先大批病亡衰敝的臺灣身體轉弱為強，但此一轉變，卻不僅使原先的臺灣身體，已質變為日本的皇民身體，甚且還要以一己肉身的銷亡，為得來不易的「皇民」身分背書。只是，此一執意於「捐軀」的年輕身體，除了輾轉於日本／臺灣之間外，還有沒有其它可能的歸屬？在此，張文環的相關論述及其小說〈頓悟〉，卻意外地開啓了另一面向。

志願兵制度實施後，張文環曾有不少相關言論發表。耐人尋味的是，他的重點多集中在志願兵將如何能使臺灣青年成為一個完整的「男人」，例如：

志願兵制度的文告發表出現在報紙的時候，或許本島青年大都會覺得終於確立了做為男性應有的面目吧！⁵⁵

男人的一生，不知道是為什麼，只想為國家獻身做事，才是男人應走的路。能夠如此，臺灣的青年也可以說已經就是完整的日本青年了。⁵⁶

在〈頓悟〉中，更藉著敘事者青年王有德的視角，對此做出極其生動的描繪：

到了六月末，公布實施本島人志願從軍的方法。這一下我好像突然被一記春雷打醒了，我想到身為男子漢應有的作為，一時情緒激盪，竟莫名其妙地流下淚水。……男孩子哭竟是這般不堪的事嗎？果真如此，自己又那還有什麼男子氣概可言？每次見到荷槍行軍的士兵，真打從心底羨慕他們。於是我想到了要志願當兵。……是男人，就一定要上戰場。……事實上，要在這個社會的叢林尋求突破，就只有去當兵一途。戰死至少要比病死或窒息而死更具有丈夫氣概。本一貫的精神目標向前邁進。而這種昂揚的士氣更能直接有貢獻於家園，所以我在其中挹注了全部的希望。而最令人興奮的是，我還得以藉此機會去跟阿蘭見面，跟她話別。⁵⁷

54 陳火泉，〈道〉，《臺灣文藝》6.3(1943.7)。

55 張文環，〈一群鴿子〉，收錄於《張文環全集：隨筆集（一）》（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2003），頁103。

56 張文環，〈燃燒的力量〉，收錄於《張文環全集：隨筆集（一）》，頁181。

57 張文環，〈頓悟〉，收入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張文環集》，頁190-191。

表面看來，這段文字仍是描述對得以志願當兵一事歡欣鼓舞，仔細分辨，箇中意蘊卻大可玩味。關鍵在於最後一段：「最令人興奮的是，我還得以藉此機會去跟阿蘭見面，跟她話別」。阿蘭是王有德私心戀慕的對象，一直苦無機會拉近距離，如今自己即將志願當兵，前往話別，於是順理成章。但如此一來，卻也曖昧化了他當兵的真正目的——究竟，他為的是戀人，還是家國？為的是日本，還是臺灣？當張文環一再強調當兵對於「男人」之重要性的同時，是否意味著「男性身體」將是取代「臺灣身體」或「皇民身體」的另一出路？其實，綜觀張文環在〈一群鴿子〉、〈燃燒的力量〉等具有為當局宣傳意味的隨筆中，仍然再三強調志願當兵是為皇國而獻身的偉大志業，然而小說書寫，卻出現了曖昧的情節，箇中曲折，值得細思。而由臺灣身體、皇民身體，以迄於男性身體的文學想像，正所以投射出殖民地臺灣的多重認同困境。⁵⁸

四、結語——誰的身體？怎樣的青春？

在針對日據時期臺灣小說中「身體政治」與「青春想像」的論析告一段落之前，我們不妨再就臺灣新文化與文學發展紀事，做一回顧：1920年，留日的臺灣學生在東京成立「新民會」，發行《臺灣青年》；1921年，蔣渭水等人在臺北創立「臺灣文化協會」；1922年，追風寫下〈她要往何處去〉；1924年，張我軍連續發表〈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臺灣文學界〉、〈為臺灣的文學界一哭〉，之後強調「少年臺灣之使命」。試看彼時臺灣的年輕學子們，是何等意氣風發，豪氣干雲。這些聲音的訴求點容或各有所重，但秉持「青春想像」以憧憬臺灣，意圖以「少年精神」抗衡老大、改造臺灣的目標，則是不約而同。從蔣渭水對組織「文化協會」動機的說明看來，這些青年，當時確乎是懷抱著「療救」的態度面對臺灣：

……臺灣人現時有病了，這病不癒，是沒有人才可造的。所以本會現今目前，不得不先著手醫治這的病根。我診斷得臺灣人所患的病，是智識的營養

58 一方面，他很可能如同前述的呂赫若一般，意圖以迂曲幽微的方式，暗示了自己不同的政治立場；另一方面，若從性別論述角度著眼，此一對身為「臺灣男性」的刻意強調，也未嘗不可視為因為身受日本殖民「去勢」之後，意欲重振「雄」風的隱喻。

不良症，除非服下知識的營養品，是萬萬不能癒的。文化運動是對這病唯一的原因療法，文化協會，就是專門講究並施行原因療法的機關。⁵⁹

然而，藉由文化與文學，臺灣果真一如期待地被啓蒙、被改造、被治療了麼？它是否會自此昂揚奮進，成長茁壯？檢視自〈她要往何處去〉以降的臺灣小說，可見的是：二十多年裡，銘記在這眾多「青春身體」之上的，乃是不斷流變的認同，是由病弱臺灣到強健皇民的體格質變。從空間與認同政治著眼，日本與臺灣，城市與鄉村，左翼關懷與布爾喬亞意識，不同的意識形態與文化政治，是如此縱橫交錯，駁雜難分。無論是改造抑或被改造，輾轉於不同的政治／文化空間之中，青少年正是以自「身」的往來趨避，點滴「體」現著殖民地臺灣的認同流轉，身世滄桑。從「療救」著眼，由病弱而強健，原是醫病雙方共同的想望。但近世以來，在「病」的隱喻已成爲國族／身體論述常見的手法之後，病弱的臺灣身體轉爲強健皇民身體的質變，則不僅凸顯出臺灣文學於殖民時期的獨特走向，⁶⁰也引發我們更複雜的思辨——文章最後，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質變之後，這會是誰的身體？臺灣？還是日本？因之所投射出的青春想像，是怎樣的青春，怎樣的想像？它會在時間軸上不斷成長，欣欣向榮？還是反而要以自身的銷亡，爲生命劃下永恆的句點？而此一質變後的文學，將會成爲臺灣文學中的「正典」麼？還是爲所謂的「文學正典」，帶來更多的自我質疑、自我解構？

引用書目

一、原始文獻

王詩琅，〈十字路〉、〈沒落〉、〈青春〉，收入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王詩琅、朱點人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

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臺北：海峽學術，1998。

朱點人，〈島都〉、〈紀念樹〉，收入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王詩琅、朱點人

59 蔣渭水，〈五個年中的我——三、組織文化協會的動機〉，原載於《臺灣民報》第67號，1925年8月26日，後收入王曉波編，《蔣渭水全集》（臺北：海峽學術，1998），頁87。

60 從劉鶯到魯迅，此前的中國小說，原不乏以醫／病關係想像家國的作法，臺灣的「病」，是否完全不同於中國，或許還多有討論的空間，但經由「療救」而體格質變，卻是臺灣殖民時期的特殊現象。

- 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
- 呂赫若，〈山川草木〉，呂赫若原著，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
- 巫永福，〈首與體〉，收入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翁鬧·巫永福·王昶雄合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
- 周金波，〈水癌〉，收入中島利郎、周振英編，《臺灣作家全集·周金波集》，臺北：前衛出版社，2002。
- 芥舟，〈社會改造與文學青年〉，收入李南衡編，《日據下臺灣新文學明集5·文獻資料選集》，臺北：明潭出版社，1979。
- 浪石生，〈面頰〉，收入葉石濤、鍾肇政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卷7《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臺北：遠景出版社，1979。
- 張文環，〈頓悟〉，收入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張文環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
- 張文環，〈一群鴿子〉、〈燃燒的力量〉，收入《張文環全集：隨筆集（一）》，臺中：臺中縣立文化中心，2003。
- 張我軍，〈致臺灣青年的一封信〉，收入張光正編，《張我軍全集》，臺北：人間出版社，2002。
- 陳火泉，〈道〉，《臺灣文藝》第6卷3號，1943年7月。
- 楊守愚，〈決裂〉、〈女丐〉、〈一個晚上〉，收入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楊守愚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
- 楊達，〈送報伙〉，收入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楊達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
- 賴和，〈一桿稱仔〉，收入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賴和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
- 龍瑛宗，〈黃家〉、〈黃昏月〉，收入葉石濤、鍾肇政編，《光復前臺灣文學全集》卷7《植有木瓜樹的小鎮》，臺北：遠景出版社，1979。
- 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收入張恆豪編，《臺灣作家全集·龍瑛宗集》，臺北：前衛出版社，1991。
- 謝春木，〈她要往何處去〉，《臺灣民報》，1922年7月10日。

二、近人論著

- 中島利郎 2002 〈周金波新論〉，載《臺灣作家全集·周金波集》，臺北：前衛出版社，頁 1-23。
- 周婉窈 2003 《海行兮的時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出版公司。
- 垂水千惠 1998 《臺灣的日本語文學》，臺北：前衛出版社。
- 施淑 1997 《兩岸文學論集》，臺北：新地出版社。
- 施淑 2001 〈龍瑛宗思想初論〉，收入臺大中文系編，《臺靜農先生百歲冥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大中文系，頁 263-274。
- 柯瑞明 1991 《臺灣風月》，臺北：自立晚報出版社。
- 柳書琴 2000 〈殖民地文化運動與皇民化：論張文環的文化觀〉，收入江自得編，《殖民地經驗與臺灣文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頁 1-43。
- 梅家玲 2001 〈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啓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19.1: 249-276。
- 許佩賢 1994 「塑造殖民地少國民——日據時期臺灣公學校教科書之分析」，臺北：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俊雅 1995 《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郭水潭 1994 《郭水潭集》，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
- 陳芳明 1998 《左翼臺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臺北：麥田出版公司。
- 陳連武 1993 「風水——空間意識形態實踐：臺北個案」，臺北：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 黃英哲編，涂翠花譯 1994 《臺灣文學研究在日本》，臺北：前衛出版社。
- 劉紀蕙 2003 〈從「不同」到「同一」：臺灣皇民主體「心」的改造與精神的形式〉，「二十世紀臺灣男性書寫的再閱讀——完全女性觀點學術研討會」論文，臺北：政治大學。
- 蘇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著，刁筱華譯 2000 《疾病的隱喻》，臺北：大田出版社。
- Bakhtin, M. M. 1981. *The Dialogic*.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 Bakhtin, M. M. 1984. *Rabelais and His Wor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Featherstone, Mike, Mike Hepworth, and Bryan S. Turner, eds. 1991. *The Body: Social*

Process and Culture Theor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Foucault, Michel. 1973.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London: Tavistock.

Foucault, Michel.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O'Neill, John. 1985. *Five Bodies: The Human Shape of Modern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urner, Bryan S. 1984. *The Body and Society*.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Body Politics and the Youth Imagination: Taiwan Fiction in the Japanese Period

Chia-ling Mei *

Abstract

Youth, as a group, are commonly viewed as the backbone of a nation's future and the pillar of its society. Carrying the promise of "freshness" and "hope," youth bear heavy societal expectations, particularly during times of national upheaval and uncertainty. Whether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eal-life reforms, youth carry symbolic importance as "national seedlings" or "future protagonists of the nation" who are imbued with unprecedented potential.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the growth of youth" and "the growth of the nation" are often viewed as being two sides of the same metaphorical coin.

Thu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language fiction has romanticized the growth and dissipation of youth to the point that its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are taken as witness to political clashes and wrench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s. During the half-century following 1895, during which Taiwan wa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groups underwent multiple transformations, from initial Taiwanese military resistance to cultural enlightenment and eventual conformity as imperial subjects. These transformations, in turn, found a heterogenous variety of expres-

* Chia-ling Mei is a professor i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at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ion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Using “body politics” and “the youth imaginary” as its mode of inquir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outline the mutually complementary development of the discourse of youth and the Taiwanese imagination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discussion is divided into two main parts: 1) space and body / identity politics; and 2)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Taiwanese body to the body of the imperial subject.

Keywords: body politics, youth imagination, Japanese occupation, Taiwan, fiction